

北戴河位于燕山脚下的戴河之北,因而得名,原来不过是渤海边上的一个小小渔村,经过百多年的沧桑,如今是与美国戴维营、俄罗斯索契齐名的首脑避暑胜地。

清光绪年间,清政府修筑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(此时山海关归临榆县管辖)铁路,英国铁路工程师金达发现这一带海滨绿树成荫,蓝天白云,大片白沙,海水平缓,是个优良的自然浴场,很合西方人夏天休闲避暑的口味。在他的宣传鼓动下,一些外国人,首先是一些传教士,以后又有一些外交官,商人纷纷在海边建立小洋房,慢慢形成大片别墅区,成为避暑胜地。以后,北京的达官商贾附庸风雅,也纷纷购地建屋,夏天能来北戴河成为一种时尚。乘火车从北京到北戴河车站,再坐驴车,甚或骑驴到海滨别墅已成时髦的旅游,以致西洋美女骑驴的照片成了当时最热门的“旅游”广告画了。

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挥师入关,北戴河获得解放。1949年开始,我国政府将北戴河作为疗养胜地,先后建立了煤矿工人疗养院、铁路工人疗养院、纺织工人疗养院等众多工人疗养院,每年都有大量的劳动英模,一线的工人到北戴河休养。1953年以后,中央和政府领导人陆续到北戴河避暑,1955年后国务院正式将北戴河作为暑期办公的地点,北戴河开始了新的兴旺时期。

第一批到北戴河的人

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不久,为了和平解决平津问题,毛主席要求四野大军提前入关,就在11月间解放了北戴河。北平和平解放后,我随华北野战军荣臻小学(后改为“八·一”小学),进入了北平。1949年春天,我妈妈带我到天津看望罗荣桓夫人林月琴,我们都称她为林妈妈。当时以平津间杨村为界,以西为华北野战军驻地,以东为东北野战军(即四野)驻地。林妈妈当时为四野干部子弟学校(今广州“八·一”学校前身)的校长,学校当时进了天津。小孩子们一个个全身整齐的卡其布校服、船形帽,小院子里有滑梯、秋千等玩具,小朋友们嘻笑追奔,十分热闹。林妈妈看我十分羡慕的样子,就和我妈妈说:“让小吧(我小时的名字)留下来跟着我吧!我这里条件好。”我没有反对,妈妈就同意了。这样我就进入了四野干部学校。因为肖克、赵尔陆叔叔都从华北调到四野随军南下了,他们的孩子、我儿时的玩伴肖星华、赵琳也来到了天津,顿时学校里更热闹了。

1949年夏季,学校来到了北戴河。这时外国传教士、国民党大官早已跑得无影无踪,大片的别墅无人居住,冷冷清清,随着我们的到来,海滨又有了生气。我们学校占据张学良的公馆——章家大院,学校大约有一百多孩子,加上教职员将近二百人了,所以连同周围的几幢别墅都成了我们的驻地。

到了北戴河我们仍然一边学习,一边休息。不上课的时候,老师带我们在海边徜徉,那是我第一次看海,那翻滚的浪花,海天一色的美景已深深印入我的脑海。老虎石礁岩上钓螃蟹是男孩子最爱的活动,用一根小竹竿或木棍绑一根细线,绑上一块肉垂入海中,一会儿功夫拉起来,绳子上往往有几只螃蟹,用他们的钳子夹住肉,甚至是绳子,拉出水面都不放,等着让我们一一摘下来,一会儿功夫就可以钓一小筒。学校还组织我们爬莲花山(现联峰山)参观鸽子窝、怪楼,最激动人心的是看日出了。老师让大家写作文,我的作文中将刚刚升起的太阳比做一个大蛋黄,遭到了同学们的嘲笑,现在想来虽然形

北戴河的故事

◆ 罗箭

【作者简介】

罗箭 原名罗小卿(罗小青),1938年4月生于延安。抗战胜利后到河北阜平县,后入“八·一小学”,1949年进入北京,中学毕业后,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原子能系,1961年2月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核物理系,毕业后分配到国防科工委第21试验基地研究所,参加了我国第一次、第二次核试验,两次荣立三等功。1966年因受父亲问题牵连,被停职。1970年被按战士复员处理当工人。1976年落实政策回到21试验基地研究所,1978年调入国防科工委机关,后到国防科工委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任政委,之后又调入总装备部后勤部任副政委,1994年被授以少将军衔。1996年退休。

象,毕竟缺少了诗意和浪漫。

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后,一路南下,摧枯拉朽,势如破竹。很快武汉、广州相继解放,学校也离开北戴河南下武汉,短短一、两个月北戴河生活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我一直以为,我们是打跑国民党后第一批到北戴河的人,后来才知道,1949年6月初,朱总司令就已经捷足先登了,但他在聂荣臻伯伯陪同下到天津、秦皇岛,视察、了解城市接管和工商业生产恢复情况,到北戴河来看看,也就住了一两天,还不是真正的休养避暑,所以我们仍可称为第一批来此休养的人。

海滨浴场

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,北戴河海滨开始热闹起来,海滨区域从河东寨开始一直到鸽子窝一带,逐步形成几大块,西边主要是中央直属单位,中间为中央领导居住的区域,东边主要是政府部门和部队单位。我们常去的浴场叫中浴场。毛主席、刘少奇、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常去中浴场,这里人最多也最热闹,不在这附近住的孩子一听说要到中浴场去都十分地高兴。周总理因住地离中浴场稍远,在中浴场旁边有个小的西浴场为他使用,我们也经常沿海边走过去玩玩。孩子们最骄傲的是这里能经常见到毛主



■ 1954年8月,刘少奇同家人在北戴河游泳



■ 1960年夏,毛主席和本文作者的父亲罗瑞卿在北戴河海滨中浴场

席。毛主席来了往往会有小小的骚动,大胆一点的孩子还会有幸和毛主席握手,有时毛主席下水,会引得一大帮孩子跟着欢呼跳跃奔向大海,真是其乐融融。主席一般上午睡觉,下午出来游泳的时候多,而北戴河的海一般是上午风平浪静,而下午浪就要大些。有一次海边刮起了大风,浪也很大,主席来到了浴场,我们都在浴场的阳台上闲坐,却看见主席穿上泳衣,在水手班几个卫士的簇拥下走向海边。当时海面上风很大,水中浪涌一波接一波,到了岸边成了翻卷的浪涛,人在海边上根本站不住。主席两次都被打得站不稳,被卫士们拉了回来。大家都力劝主席不要下去了,风大天凉,改天再游,但见主席摆摆手,又一次冲向大海,在卫士们扶持下,终于冲过海边的卷浪跳入深海了。到了海中,主席又恢复了他独有的闲庭信步的神态,半躺在水中,任由浪涌推动一上一下的漂浮,岸边的我们早已看得目瞪口呆。以后年事稍长,看到主席的诗词“自信人生二百年,会当击水三千里”。才渐渐明白主席说的“与天争斗其乐无穷”的意境了。

在浴场里很少见到江青,她来了也从不下水游泳,那时她热衷摄影,来了也不和我们打招呼,很少有孩子和她亲近,我们见了她只是叫“江青阿姨”,都略略有点怕她,没有见到老妈妈们的亲切。她几次到浴场都是拉着一个叫“小李”的女服务员做她的摄影“模特”,在阳台上,在海边摆拍,我们只是远远地站着看。

早些年还见过刘思齐。我们到浴场常常见到一个大姐姐,脑后一条又长又粗的辫子,站在阳台边静静地远望大海,一动不动,一声不吭,一站一上午。我们到了浴场,爸爸妈妈就告诫我们不许吵闹,更不许打扰这位大姐姐。后来妈妈悄悄告诉我这是刘思齐,毛岸英大哥的遗孀。爸爸妈妈常用毛岸英的事迹教导我们,在心目中毛岸英大哥早已成为我们的偶像,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因此对刘思齐大姐姐也一样尊重,还有同情。听爸爸妈妈说主席很想为刘思齐再找个伴侣,他们也为此操心过,最后刘思齐终于和一位飞行员再婚了。

不知道为什么,李敏、李讷到北戴河海滨的次数不多,倒是毛远新年年都来,还偶尔见过他的姐姐远志大姐。远新和我们年岁相仿,也都是同学,相处毫无拘束。当年哈军工

成立时朝鲜战争尚未结束,军校学生毕业后走上战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,所以中央在政治局研究成立哈军工的会议上,陈毅伯伯拱手与到会的领导同志相约:请今天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带头,送你们的子女上哈军工。这也是后来上哈军工的领导子女特别多的原因之一,陈毅伯伯的二儿子陈丹淮也上了哈军工。上哈军工也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向往的事情。我当时考上中国科大,已上到大三,最后在父母的支持下转学到了哈军工。

刘少奇一家也经常来海滨浴场,他们是个大家庭,除了光美阿姨的四个子女外,还有少奇伯伯前妻何葆贞烈士的子女爱琴大姐、刘允若,以及刘涛和丁丁。有时还有少奇伯伯的一些侄儿侄女,往往是一大家人来。但他们家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有亲情。光美阿姨对别人家的孩子也十分友善,在浴场是个非常受欢迎的阿姨,更可贵的是,他们是可以全家集体下海的少数几个家庭之一。一家人在爸爸妈妈带领下排成一队在海中游泳,我们家也是其中之一,这往往引来海边许多人羡慕的目光。

朱老总家也是个大家庭,他虽然只有一儿一女,但孙子、外孙一大群,还有许许多多亲戚的后代收养在家,也是海滩上最热闹的一家。朱老总为人慈祥,我们都喊他“爹爹”——四川话“爸爸”的意思。因为在延安,许多前方将领的孩子都被放在爹爹家中,我和刘帅的儿子太行,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都长期寄养在爹爹家中,还有很多孩子都受过爹爹的恩泽。老总的老伴康妈妈更是孩子们慈祥的妈妈,他们到来,都是孩子们最受欢迎的人。老总喜欢下象棋,他一下棋总是围着一大堆孩子,只有看爹爹下棋,孩子们可以胡说八道,乱讲乱评。一次看爹爹和彭德怀下象棋,不记得谁输了,王若飞的儿子王兴还丧气地说了声:“臭棋篓子!”两位老总谁也不恼。

朱敏姐姐先后生了五个儿子,她和刘铮大哥长期在苏联工作、生活过,给儿子起了个俄文小名,老二叫“沃沃”,我们叫他“窝头”,是海滩上的小明星,他一来许多大孩子都争抢着抱他玩,为我们增添不少乐趣。

陈云伯伯话语不多,来了就坐在沙滩上晒太阳,很少下海。而于若木阿姨喜欢游泳,一个人常常可以游得很远。我们一些大男孩游到海中间一块浮板上,我们叫“白板”。在白板上我们反复跳水甚至叫小弟弟、妹妹们坐在白板上,我们从他们头上飞身跃下海水,听他们尖叫寻求刺激。常常发现于若木阿姨也来跳水,而且姿势相当优美。

小平伯伯原来在东浴场,后来也到了中浴场。他很喜欢游泳,常常下海。但他更喜欢看球赛。暑期我们组织了一个球队,小平伯伯的小妹妹邓先群比我们大不了几岁。有的人叫她小姑姑,有的人又叫她大姐,也没人较真儿。她当我们的教练。有一次我们和来北戴河休养的煤矿女篮比赛,毛毛(邓榕)叫我们快点开始,说她爸爸来看球了,我们回头见小平伯伯搬个小板凳已坐在场边

了。从头到尾只他这一个观众,真令我们受宠若惊。当然,我们最后取得了胜利,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青睐。

在浴场从来没有见到林彪,也没有见到他们家的人,原来林彪怕水,见不得水,连海涛声也听不得。最初让他住82号楼,已经远离海边,但远远地能看到海面,这也不行,只好搬走。后来我们一家住进了82号楼,比我们原来住的17、18楼大了一些,但离海边也远了好些,终不如过去下海方便了。

中国夏都

自1955年以后,毛主席每年夏天几乎都要来北戴河,在这里召开了多次重要的会议,做出了许多重大的决策,与中国命运相关的许多大事都发端于北戴河。北戴河成了中国的夏都。

1958年8月23日,下午五时三十分,福建前线近500门大炮突然一齐开火,近三万发炮弹砸向金门,金门岛顿时淹没在浓烟烈焰之中,料罗湾码头一片火海,大小碉堡不管明的、暗的都被炸翻,几条海面上的舰船飞快地逃向深海才得以避免被击沉的命运。守卫金门的司令长官胡璉虽逃过一劫,但他的副司令赵家骧和澎湖副司令吉星文、章杰却在炮击中丧生。而指挥这场炮击的正是毛主席,大本营就在北戴河,为了亲自掌控局面,甚至将前线指挥官叶飞招来北戴河。炮击金门一下子让美国人、蒋介石慌了手脚,连当时的“老大哥”赫鲁晓夫也不清楚毛主席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其实炮击金门,主席早有打算。上世纪50年代初,解放台湾已有计划,前线总指挥为粟裕将军。后来朝鲜战争爆发,美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,并于1954年12月和台湾当局签订了《共同防御条约》,美国人的插手使我们解放台湾更趋复杂,必须再选择适当时机。

1961年7月北戴河又一次热闹起来,不但来了许多领导,还来了许多国防工业战线的人,有干部、有专家和技术人员,他们是来参加贺龙、聂荣臻元帅和我的父亲罗瑞卿主持的国防工业工作会议。由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,给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问题,中央提出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,就是放慢脚步、精简项目以休养生息的方针。国防工业开会落实中央的要求,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

在讨论原子弹研制项目时,许多人因经济困难,苏联撤走专家,技术复杂,难以突破,主张下马,先放一放,待时机成熟再上马。也有许多人认为不能下马,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前期工作,有了一定的基础,加上全国一盘棋的有力支持,要咬牙坚持下去。没有苏联人,我们的专家、技术人员早已下定决心自己搞出来。1960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收到苏联撤回专家的正式照会,主席指示: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。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,极好!如果给了,这个账是很难还的。支持这个意见的人中有外交部长陈毅,他说:赫鲁晓夫嘲笑中国三个人穿一条裤子,我们再穿,脱了裤子当也要搞出这个东西。我的包包里一边装着钱,一边装着原子弹,走到哪里都受欢迎,我的腰杆就硬。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也说:叫花子还要有一根打狗棍呢!争论的意见报上去,还是毛主席和中央下了决心把原子弹研制继续搞下去。

1964年10月16日,我国终于炸响了第一颗原子弹,毛主席听了很高兴,说“要给赫鲁晓夫发个一吨重的奖章”。有了原子弹就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!